



杨格《抗战外援:1937—1945 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评介

吴景平

2019 年 8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抗战外援:1937—1945 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以下简称“《抗战外援》”),立即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多个网络媒体发表了有关《抗战外援》的书评、导读和书摘,普遍认可该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抗战期间中日在金融领域的交锋”。^①一时间“中国抗战与外援”“外援与通货膨胀”等成为热点话题。^②《抗战外援》英文原著(以下简称“杨著”)是原国民政府美籍财经顾问杨格(Arthur N. Young, 1890—1984)^③撰写的。^④这是一部关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力作,非常值得向中文读者尤其是抗战史研究者推荐,中文版译校者和出版机构表现出的识力和努力,值得充分肯定。

杨格在原著引言中曾写道:“本书既是历史,也是回忆录。”^⑤确实,书中有较多第一人称的叙事和评议,甚至直接引述作者自己的日记,但该书决非单纯的回忆录,更不是自传。笔者非常赞同中译本“内容简介”中的评语:“本书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著作,为读者认识 1937—1945 年这段时期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该书的“珍贵”之处或者说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抗战史著作之处,体现在该书作者的身份和经历、出版后半多个世纪始终得到学界的关注以及书中内容的不可替代性。

杨格是一位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学者,本科毕业于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先后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通过夜校部的学习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杨格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克林顿市的长老会学院执教,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讲师,主要讲授税收和公共财政课程。来华之前,杨格已经有过在美国政府担任财经事务职位的经历,如美国战时贸易部的贸易专家

① 阿瑟·N. 杨格著,李雯雯译:《抗战外援:1937—1945 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内容简介”,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② 参见姚遥《重新认识中国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中国新闻周刊》第 27 期,2019 年 7 月 31 日,第 82 页;陈晓平:《抗战外援与通货膨胀的关联》,《南方周末》,2019 年 8 月 1 日,C24 版。

③ 在国民政府的档案文件中,杨格的中文译名还有杨爱德、杨亚德、杨亚瑟;杨格在为其关于中国的第一本著作 *China'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的中译本《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所作序言中,落款为“杨安德”。

④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 - 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⑤ 阿瑟·N. 杨格:《抗战外援》,“引言”,第 9 页。

(1918 年)、国务院外贸顾问办公室经济专家(1919—1920 年)、国务院财政专家(1921—1922 年)、国务院经济顾问(1922—1928 年)等。不仅如此,杨格还有较丰富的国际财税领域的工作阅历,如担任过墨西哥政府税务顾问(1918 年)、美国国务院调查西班牙财政状况的贸易专员(1919 年)、洪都拉斯政府的财政顾问(1920—1921 年),以及作为美国派赴巴黎担任道威斯计划的副观察员(1924 年)、华盛顿石油污染国际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1926 年)、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专家(1927 年)。按照杨格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成为甘末尔赴华调查团的成员之一,不仅因为曾是甘末尔(Edwin W. Kemmerer)的学生,还因为“我有在拉丁美洲的经历,我有在欧洲的经历,包括在西班牙近一年和在道威斯计划巴黎赔偿会议的六个月”。促使杨格最后下决心辞去美国国务院的职位并前往中国,还因为赫伯特·胡佛(Herbert C. Hoover)即将出任第 31 任美国总统,而杨格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期间曾与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胡佛有过不快的交往。^①

杨格在接受国民政府和中央银行顾问的聘任时,并没有预料到他的聘期会延续 19 年之长,其中包括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和中国全面抗战的 8 年。经过 1935 年的法币改革和嗣后确定中央储备银行的改革方案之后,杨格认为中国的新币制获得了成功,中央银行运行良好,他决定于 1937 年底辞职回美,为此还重新修订了与中方的聘任合同。“正在此时日本人于 1937 年 7 月发难,中国政府深陷困境,我觉得有责任留下来与他们一起。”^②全面抗战时期,杨格除了依旧担任国民政府和中央银行顾问之外,还出任了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中美文化协会副会长、国民政府善后经济委员会顾问、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等多个职位。杨格是战时国民政府各项重大财经决策文件的起草人或咨询者,更代表国民政府与英美方面就援华事项直接进行过多次多轮沟通、洽商和正式会谈,是争取“抗战外援”这一特殊而重大历史使命的推进者、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而且是相关历史文件的保管者、整理者。

《抗战外援》的英文原著自问世之后,即受到英语学术界的关注。1964 年,便有美国学者在《美国的政策与中国:1937—1950 年》^③的题目下对三本著作进行了讨论,杨格的这部著作排在第一本,另外两本分别是美国达拉斯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安东尼·库贝克(Anthony Kubeck)的《远东是如何丢失的》^④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1—1950》。^⑤ 20 世纪 70 年代问世的几种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著作把杨著列入参考与征引书目,其中就有 1971 年出版的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⑥ 1977 年问世的薛光前编著的英文版《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也征引过杨著。^⑦ 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⑧、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柯伟林的代表作之一《德国与中华民国》^⑨,也都把杨著列入参考书目,其中译本也保留了原

① 杨格口述访谈(1974 年 2 月 21 日),杨格档案,第 110 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② 杨格口述访谈(1974 年 2 月 21 日),杨格档案,第 110 盒。

③ Richard W. Leopold, “Discussions and Reviews: American Policy and China, 1937—1950,”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 No. 4 (1964).

④ Anthony Kubec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41—1949* (Chicago: Regnery, 1963).

⑤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⑥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1).

⑦ Paul K. T. Sih,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77).

⑧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⑨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著中的全部引注和参考文献目录。^①根据“谷歌学术”的检索,自从1963年杨格这部著作出版后,英文研究论著中相关的引述和评议超过100多篇(部),而自2000年以来的近20年里就达50余篇。^②完全可以说,《抗战外援》英文底本在英语学术界已经成为“传世之作”。

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初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起^③,在中文学界出版的抗战史研究专著便不断把杨著列入参考征引书目。1987年出版的《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一书在论述战时苏联、英国和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史事时,对杨著有不少征引。^④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多种论及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把杨著列入参考书目,如:《宋子文与战时外交》(陈立文著,台北,“国史馆”1991年版)、《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徐蓝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宋子文评传》(吴景平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美关系史(1911—1950)》(陶文钊著,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任东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罗志刚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2000年后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代通史》的抗战卷^⑤,2010年之后关于战时美援的新成果^⑥,以及齐锡生接续推出的两本关于战时中美关系的新著^⑦,其参考书目中亦均列有杨著。可见,数十年来,杨格的这部著作同样受到中文学术界的关注,是抗战史研究尤其是战时中外关系乃至更为专门性研究的必读书。

杨格的这部著作是“抗战外援”这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内容几乎包括了“抗战外援”所有的重大案例,涉及德、苏、法、英、美等主要大国在“援华”问题上与中国的关系。如中德易货关系和在华德国顾问;《中苏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对华三次贷款和军事援助;法国对华信贷和法越交通线;英国对华信贷、海关制度、平准基金和财政援助;美国对华商业信贷、平准基金、租借法案物资、冻结资产、财政借款、在华美军开支和中美汇率、购买黄金;涉及多国关系的停付外债本息、布雷顿森林会议等等,涵盖了1937—1945年的全时段。而在战时财经外交上,该书的专业性非常明显。《抗战外援》的中文书名有一个副题“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在“内容简介”首先提到“本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有其道理。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就是围绕财政和金融展开的中外交涉,各章节标题中涉及金融尤其货币的关键词甚多,如:金融、货币、币值、通货膨胀、基金、法币、黄金、售金、供应黄金、白银、外汇、英镑、美元等;以及诸多财政类关键词,如:财政、税务、债务、借款、债券、资金、费用、军费、偿债、贷款、赤字、海关、盐税等。尤其是在中美财经外交的研究上,杨著的特点不仅在于重大案例的全面性和征引史料的多样性、权威性,还在于对关键性史料及相应史事的精准把握,揭示出美方援华决策所涉及的体制、机构、人事等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性。如1942年初美国白宫、财政部和国务院在是否接受中方5亿美元借款要求问题上产生分歧时,书中特别指出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将中国绑进我们的战

① 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谷歌学术: <http://scholar.google.com.hk/>, 2019年11月20日。

③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

④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第146、177、213、222、224、236页。

⑤ 吴景平、曹振威:《中华民国史(1937—1941)》,中华书局2011年版;王建朗、曾景忠:《中国近代通史》第9卷,“抗日战争”(1937—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⑥ 杨雨青:《美援为何无效?战时中国经济危机与中美应对之道》,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⑦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争”的名句所起到的作用。^① 完全可以说,与杨著相比,迄今为止关于战时财经外交的著作中,无论是具体内容的广泛性还是专门性、深度,罕有其匹。杨格在书中对战时财经领域中的诸多中外交涉的叙事和评判,是相关研究者必须仔细研读和知晓的。

杨格去世翌年问世的英文版《宋氏家族》曾借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线人”之口,称杨格跟“宋家帮”关系密切,“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写过一本书来粉饰蒋介石政权”。^② 事实上,杨格在书中并不回避对“抗战外援”问题上国民政府与各相关大国之间的是非曲直、恩恩怨怨的评议,包括批评抗战后期的国民政府“厌倦言兵且四分五裂”。^③ 这些评议是否客观、全面、公允,读者可以见仁见智,自行研判。但从拓展抗战史研究的视野来看,应当指出,杨格的关切没有停留在有关援华协定的文本上,即不仅介绍达成协定前的中外之间的交涉,还注意到协定达成后的实际运作情况。“援助”是否达到和如何达到中国一方,无论顺利与否,杨格都会予以评析。尤其是中美财经交涉方面,杨格对那些事关重大、交涉耗时多但结局对中美双方都不尽满意的个案(如抗战后期驻华美军开支以及法币与美元汇率),甚至最终未能达成协定的个案(如 1943—1944 年关于 10 亿美元借款的谈判),同样予以较多的叙事和评析。正如他在 1965 年出版的《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胀 1937—1945》中指出的,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 - 1945* 一书关注的是在抗战时期,中国为自己做了什么,其他国家为中国做了什么;同时也关注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做到什么。^④ 换言之,“抗战外援”不仅是结果,更是过程;无论对中国还是有关大国,对援助的获得方和提供方,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论成败得失,其原因是复杂的,作用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都应当是“抗战外援”的研究对象。只要比照《抗战外援》与本文提及的各中文著作的章节目录名称,便很容易找到战时中外关系尤其是财经外交研究方面有待推进的选题。这也是《抗战外援》作为中译本的重要价值所在。

史料的翔实性、独特性,是杨格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乃至历史地位的基础。如杨格所言:“资料来源上,除了我自己的回忆外,我还使用了我在 1929—1947 年担任中国财政顾问的近 19 年的时间里收集并完整保存的文件资料。”“由于战时和战后大量官方记录的遗失,它们在很多问题上,甚至比现存的其他地方的记录都要完整”。^⑤ “这些中英文资料囊括了书信文电、备忘录、报告、统计数据、期刊、手册和书籍。同时,我还采用了日记中的部分素材,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⑥ 这些资料,应当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保存的杨格档案中的主体部分,其中第 62 盒至 106 盒属于 1937 年之后的资料,各盒之内又按专题划分若干文件夹,主要专题有物价、中央银行、货币、与罗杰斯和贝祖诒的电报、汇率控制、外汇配给、进口与出口、平准基金、租借援助、美国冻结资产、贸易控制、海关、英日海关协定、盐务、税收、土地税、预算、市场报告、国际货币基金、华北货币、中央储备银行、华兴银行、傀儡货币、联总、行总、战后计划、债务、海关担保内债、救国公债、庚子赔款、四联总处、俄国援助、法国—比利时借款(1937—1941)、英国购料信贷(1938—1941)、陈光甫赴美使命(1938—1940)、宋子文使命(1940—1941)、美国 5 亿美元

① 阿瑟·N. 杨格:《抗战外援》,第 231—234 页。

② 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孙文龙译:《宋氏家族》,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版,第 522 页。该书英文版的参考文献和索引中列举有杨著,但中译本删去了引注、参考文献和索引。参见 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Limited, 1985), pp. 407, 512, 532。

③ 阿瑟·N. 杨格:《抗战外援》,第 296 页。

④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 - 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⑤ 阿瑟·N. 杨格:《抗战外援》,“引言”,第 9 页。

⑥ 阿瑟·N. 杨格:《抗战外援》,“参考文献说明”,第 479 页。

借款(1942—1945)、外国借款,等等。另外,杨格的个人日记稿也在档案中。正是基于这批档案,杨著在史料运用方面的权威性、独到性,是迄今为止其他有关战时中外财经外交的论著所无法企及的。

此外,杨著中所用的史料,并不限于杨格在中国担任顾问期间保存的文件。《抗战外援》正文之后有数页篇幅的“参考文献说明”,主要是对所征引的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军方等多种未刊档案史料和其他已刊资料及著述的说明,很值得关注。比如,杨格高度评价战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日记的史料价值:“说到财政部档案,我能查阅大量摩根索日记的复印件实属幸运。”“这些日记,以及国务院和战争部的出版物和档案,对中国的记载披露的情况作了难能可贵的补充。摩根索先生留存了一份如此详尽地反映政策制订并付诸实施过程的记录,值得称道”。^①需要指出的是,杨格撰写时,附有索引的排印版两卷本《摩根索日记(中国)》尚未出版^②,他查阅的是未经整理的数量浩繁的摩根索日记原稿,仅《抗战外援》第17章共34条引注中,直接引自摩根索日记的有19条,而且是来自摩根索日记第666卷至第847卷之间不同的16卷。^③由此可见杨格这部著作的史料学价值。

《抗战外援》英文版共500余页,涉及战时中国与多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内容涵盖财政、金融、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领域,涉及大量的中外人名、机构名称和专业词语,可以想见翻译量之大和难度之高。作为这部关于战时财经外交传世之作的全译本,《抗战外援》无疑将极大地有助于诸多抗战史研究者更便利地查阅和掌握原著的内容,根据原著中有关的史事、史料以及视野、观点,作进一步的专门性研究。不过,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发现若干翻译方面的问题,现提出来请教译校者及读者同仁。

《抗战外援》不仅包括了原著中的前言、引言、致谢、导读和正文21章,还保留了附录、参考文献说明以及英文注释,在翻译的完整性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目录页中略去了附录中5份统计资料的名称,这不利于读者利用。原著最后所附整整24页的索引没有保留,非常可惜。在笔者看来,译文中一些差错的发生可能与翻译中没有充分利用索引有关。比如人名、机构名的中译,或采用较通行的译名,或新译,本来没有刚性的规定,但如果多次出现,译名必须一致,相关的索引就可以起到这样的提醒作用。如果同一西文名却出现不同的中译,就会导致阅读把握的差错。

比如,《抗战外援》中分别出现过“驻法大使蒲立德亦在巴黎致信罗斯福总统”(第81页)和“布利特大使从巴黎向赫尔国务卿报告说”(第112—113页),查杨格原著索引,这两处大使的英文名都是William C. Bullitt,即美国驻法大使^④,虽然在不同的译著中,“蒲立德”和“布利特”的译名都可以见到。

又如机构和职衔的翻译。《抗战外援》提及中央银行的席德懋,既有“业务局局长席德懋”(第41页),也有“中央银行业务部经理席德懋”(第67页),而原著中的英文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两处中文机构名还不至于引起歧义,那么《抗战外援》中既有“财政部长孔祥熙”(第194页,多数场合),但也出现过“孔祥熙作为金融部长”(第185页)。英文中Finance兼有“财政”和“金融”的含义,但国民政府时期只有财政部,未曾设“金融部”。

《抗战外援》对于原著中的一些特定历史类名词按字面直译,这容易产生差错。如书中两次出

① 阿瑟·N. 杨格:《抗战外援》,“参考文献说明”,第480页。

② *Morgenthau Diary, China*(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

③ 阿瑟·N. 杨格:《抗战外援》,第512—514页。

④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Index, p. 481.

现 1937 年的“自由公债”(第 45、249 页),就是对原书中“Liberty Loan”的直译,只要查一下诸如《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等文献资料,便知道是 5 亿元法币的救国公债。至于把原著中提到的英文杂志 *Finance and Commerce* 直译为《财政与商业》(第 72 页),实际上该杂志封面上不仅有英文名,还印有“金融商业报”的中文名。此外,把闻名遐迩的美国二战史系列之一的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译成《史迪威指挥问题》而不是《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或许还可以商榷;但把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的英文名回译为《苏联在中国》,显然应当避免。当然,如果苛求的话,还可以找出一些可以探讨的翻译方面的问题,但整体而言,瑕不掩瑜,无论从专业还是从文句来看,《抗战外援》的译文流畅达意,是一部成功的抗战史研究译著。

[作者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战地日记》翻译出版

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刘峰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出版,40.6 万字,88 元

1937 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继续侵略中国并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发动了淞沪战役,并乘势占领了南京。占领南京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 6 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犯下了血腥暴行。本书收集了对俘虏实施批量屠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 19 名基层军官、士兵的战地日记。这些日记都是日本军人自己书写的阵中生活及战争、行军情况,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日本军人从农民、邮递员、公司职员、公务员等普通民众,到应征入伍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心灵历程,再现了南京大屠杀那段残酷的历史。日记内容真实深刻,撼人心灵。该书除日记正文外,还附有原日记的影印本及作者的简单情况介绍、日记来源等,是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历史资料。本书不仅为批驳日本右翼的各种谬论提供有力证据,也为深化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李期耀)

The CPC's Responses to the Betrayal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adres in North China Resistance Base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Yang Dong, Li Gelin (51)

The cruelt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well known, so it is inevitable for any Party to have a minority of defectors and traitors. However, the betrayal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of the CPC showed differ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gions and groups. The defections of a small number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to the enemy were, of cours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sts and even contrary to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munists. Therefore, the CPC paid great attentions to th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the defectors. In the contradiction and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defecting to enemy" was almost the expression of mutual recriminations of both sides. The Kuomintang accused the CPC from the angl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s rule, while the CPC refuted i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Because the CPC timely made correct contingency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deal with problems, the defection of a few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ersonnel in the North China Base Areas did not aff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PC's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CPC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werful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spirit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Kuomintang's Works of Arming Civilians in Guangdong under "Military-Civilian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 People's Anti-Japan and Self-defense Corps Li Hao (68)

"Showa Trading Company"—A Company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War Guo Xunchun (80)

"War! There is War Everywhere!"—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Goebbels Diary Peter Harmsen (93)

The complete diary of Joseph Goebbels, the Nazi German Propaganda Minister, was only used by historians in recent years. Previous important articles and books on Germa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ave failed to use this historical material.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problem: to what extent the pub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in Goebbels diary will correct the past views about the extent of Germany's involvement in the Far East crisis. The articl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itler's role in decision-making in 1937, and gives concrete evidence that the German dictator turned to pro-Japanese position, which was actually earlier than previous speculation. In addition, Goebbels diary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Hitler's view of East Asia by Nazi ideology was perhaps far more beyond previous estimates.

Paper and War: Paper Shortage and the Social Respons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u Xuming (103)

The Studies on Opium Invasion Policies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War Wang Meiping (120)

Commentary o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by Arthur N. Young Wu Jingping (132)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War Mobilization and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n Yan (138)

A Summary of the Sino-Japane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artime Mobilization in East Asian—Impact and Heritage" Gao Shihua (142)

A Summary of "The Fourth High-level Forum on the Study of the Great Rear Area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Gao Xiaobo (147)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Stud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or Seventy Years" Zhang Yan, Yan Yong (152)

General Table of Contents,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2019* (157)